学术评论

评杨斌《流动的疆域：全球视野下的云南与中国》

成一农　孙　波

杨斌《流动的疆域：全球视野下的云南与中国》（以下简称《流动的疆域》）是作者在其2004年美国东北大学历史学（世界史方向）博士学位论文《季风之北：彩云之南：云南的形成（公元前二世纪至公元二十世纪）》基础上整理出版的。英文版最初于2008年由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电子版，① 后于2009年出版了纸本，2021由台湾八旗文化出版了中文繁体字版。②

从该书“台湾版序”来看，杨斌希望用“跨疆界”或“全球”视野，“将中国边疆史、地方史作为世界史来研究”（5，括号中的数字表示的是中文繁体版的页码，下同），也即“本书在方法论上主张将中国置于世界之中，而不是世界之外”（12），并“在探讨中华文明与中华帝国的形成时，本书批评了北方中心论，强调须给予南方足够的关注和重视”（12）；“在边疆和族群研究中，本书严肃地批判了文化上的中国中心论和族群上的汉人中心论”（13）；希望从讨论“云南人”的身份（认同）入手来讨论“中国”“中国人”概念的形成以及认同；“以此看来，本书其实对于新清史试图回答以及存在问题也做了一些间接的回应，尤其是强调了应当重视南方以及南方族群在明清中国乃至中华文明进程的历史角色重要性”（18）。

虽然无论是该书的研究方法、研究的切入点，还是某些结论，以及学术指向，在今天中国史学界已经不太“新奇”，但一方面要记住这本书最初撰写于21世纪初，因此放置到那个时代的学术环境来看，其在众多方面都具有一定的创新性，至少是融合了当时学术界的一些前沿视角；另一方面，时至今日，中国学界尝试从这些视角进行的研究依然不多。因此该书对于中国史学中相关领域的研究而言依然具有借鉴意义。

不过，虽然给予了《流动的疆域》以极高的评价，但这并不意味着本文认为这本著作有很高的学术水准。因为无论是研究视角还是结论等，都需要通过论证才能成立，但对于这本著作的论证方式以及一些重要的结论，本文认为存在不少值得讨论之处。

[收稿日期]　2022-09-16

[作者简介]　成一农（1974—　），男，云南大学历史与档案学院研究员、特聘教授，云南650091，chengyinong@aliyun.com；孙波（1991—　），男，云南大学历史与档案学院博士研究生，云南650091，451290306@qq.com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中国历史研究院重大历史问题研究专项2022年度重大招标项目“中国古代边疆治理的实践及得失研究”（22VLS010）阶段性成果。

① Bin Yang, *Between Winds and Clouds: The Making of Yunnan (Second Century BCE – 20th Century CE)*, N Y.: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8.

② 杨斌：《流动的疆域：全球视野下的云南与中国》，韩翔中译，八旗文化，2021年。

一

就研究者的出发点或者看待历史的视角而言，对于历史的论述方式大致可以分为两种，即“顺时而观”和“后见之明”。

所谓“顺时而观”指的是站到所论述的人物、事件等所在的时间点，尽量按照时人（既可以是个人，也可以是群体）的思考方式，沿着时间脉络对历史过程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叙述。简言之，“顺时而观”希望表达的是从某个视角看到的历史的“原貌”以及动因。或者说，历史原本可能是无规律，无目的，或者至少是有无数面相的，但“顺时而观”则希望从时人的某个角度来描述他们所看到和认知的历史及其走向和规律，他们面对问题时的所思、所想、所感以及由此对历史进程的影响等，也即在从这一视角进行研究时，研究者应当抱有“同情之理解”的态度。

所谓的“后见之明”，描述的是今人以今天的某种方式看到和理解的历史及其动因，强调的是今人对历史、历史过程及其动因的分析，由此可以按照预设的理论挑选史实构成论述所需要的历史，更可以从各种角度以及使用各种现代的方法分析古人可能意识不到的所谓的规律或者动因等等，由此也就可以对历史、历史人物等按照今人的理解进行各方面的评判。

需要强调的就是，无论“顺时而观”，还是“后见之明”，都不是对历史事实的描述，都属于历史解释或者历史阐释的范畴。即使是强调“同情之理解”的“顺时而观”，由于现代研究者不可能真正从时人以及当事人的视角观看和思考，且在研究中不可避免地夹杂现代人的认知，更不用说“顺时而观”也是有视角的，而这种视角也就过滤以及扭曲了史实。

这两种视角本身并无对错可言，都有着各自的优点和缺点，有着不同的适用场合。不过，在历史研究者以及爱好者中，似乎都更倾向于“顺时而观”，因为在“科学主义”影响下形成的以“实证主义史学”为主导的现代史学中，通常将“符合史实”以及“客观”作为评判标准，而与夹杂着现代理论和方法等的“后见之明”相比，“顺时而观”显然更符合这一标准，由此也就更具有“说服力”。

那么现在的问题是，杨斌的这本著作采用的视角是什么呢？这点作者没有明言，这也是阅读这本书的过程中一直令人感到困惑的一点。之所以感到困惑，主要是以下原因：

杨斌虽然没有在正文中强调他撰写该书的视角，但在“跋：何为‘中国’？——《宅兹中国》引发的思考”中他论述到：“首先，这个中国不是现在中国人理解的中国概念，当然也不能将其溯流而上至于商周时期甚至更早。因为历史学的一个根本性的原则就是根据时间而单向流动，因古至今，顺流而下，而绝不能以今推古，逆流而上。逆流而上是以果推因，忽视抹杀了历史的多种可能性。假如接受了这个原则和前提的话，我们必然考虑最初的中国概念（无论是传说中的夏，还是商、周），而后顺流而下，分析此后的中国。也就是说，从最初的中国出发，我们顺着时间的长河一路泛舟，发现东西南北的支流纷纷汇入，不断增强水量，拓宽河岸，冲刷河床；与此同时，两岸和河床的地形地势，也束缚、阻碍、引导、扭曲、孕育着河流的水势。假如这个比喻还算恰当，那么，最初的河流或者河流的上游，与河流的中游与下游即使一脉相承，也是大不一样的，甚至大相径庭的。最极端的可能性包括，此河流非彼河流，最初的源头并非最主要最早的源头。中途汇入的所谓‘支流’反而有可能是大河的源头。”（364）从这段论述来看，杨斌显然强调是“顺时而观”的视角，[1] 他还认为这是“历史学的一个根本

① 当然，虽然“逆流而上是以果推因，忽视抹杀了历史的多种可能性”，但他没有意识到“顺流而下，同样会抹杀历史的多种可能性”。

性的原则”，而“以今推古”的“后见之明”是“绝不能”的。虽然他此后又提到“以上当然只是理论上可能性的讨论。这种比喻，或者只有形象上的相似罢了”，即他可能认为“顺时而观”可能只是一种“理论”，但紧接着他又论述“可是，如果这种比喻勉强可以和中国这个概念的形成有一些相似，那么，我们不得不需要承认并思考，在一个中国这个大前提下，似乎也存在着重大历史发展阶段的中国”（365），也即他认为“顺时而观”地看待“中国”概念的形成是可行的。

虽然这段文字源自《流动的疆域》一书出版之后杨斌对葛兆光《宅兹中国》一书的书评，但通读书评，可以感觉这一书评是《流动的疆域》思路的延续，典型的就是书评的最后一节，且如果“顺时而观”是他在《流动的疆域》撰写后形成的认知的话，那么在指出了该书的一些问题的台湾版序言中，他应当也会对此进行说明。而且，确实在书中也可以找到一些对此不那么直接的表述，如“云南与诸多文化的诸多联系表明，唯有采取全球视野，方能解释中国统合云南的成功；然而，目前为止这一过程依然还只是在国族的历史范畴中探讨。透过想像而建立起来的国家或区域的边界，某种程度反而阻碍了这个世界——也包括云南这样的边疆地区——原本全面的、深刻的、生动的景象”（94），其中“原本”一词的使用，似乎显示作者强调是历史研究要“顺时而观”，或者至少要回到“历史现场”；还有，“笔者将自公元前三世纪至十四世纪期间外来势力对云南的军事征服行动置于其原来的历史场景之中，也就是跨国、跨边界、跨区域互动的脉络之中，其涉及的空间范围包括东亚、东南亚、中亚与南亚之部分区域”（109），其中“置于其原来的历史场景之中”一句似乎表达的也是这样的意思。

不过，全书中又存在诸多与此矛盾之处，如在台湾版序言中杨斌提到：“第一，是对云南‘在地角色’书写的不足。笔者在资格考试中的博论选题中曾开门见山地自问自答：云南的形成难道就是凭借着中国的‘一己之力’吗？难道没有国际角色和势力的影响吗？难道没有地方角色的作用吗？因此，在尚未开始研究之前，笔者的构思已经非常明确地将中国、国际以及地方三者并列，这在当时，确实是个相当新颖的立意。可惜的是，在写作过程中，几稿之后，关于地方角色的问句消失了，实在不应该”（19）。从这段论述看，他的研究实际上已经预设了一个前提，即在云南的形成中存在三个并列的角色，即“中国、国际以及地方”。不过，这个问题并不严重，因为即使是“顺时而观”，在“观”的时候也要选择某种视角，因此杨斌挑选“中国、国际以及地方”作为历史角色来“观”是没有问题的。而且，如前文所述，他对“中国中心论”提出了严厉的批评，由此更可以理解杨斌选择“中国、国际以及地方”的意义，即希望从更为“全面”的角度来“观”，这应当也是其希望取得突破之处。

关键的问题在于《流动的疆域》使用了大量在从这两个角色“观”历史时不应出现的概念和术语，如整部著作基本将历代“王朝”称为“帝国”“国家”等，还有将“王朝”与“中国”等同起来，此外还使用了如“中华殖民主义”这样典型的现代词汇。虽然我们现代人可以将“王朝”认为是“帝国”，但王朝时期并没有“帝国”的概念；王朝时期虽然存在“国家”的概念，但其与现代“国家”之间似乎也存在差异；虽然我们现代人有时将“王朝”与“中国”等同起来，但王朝时期这两个概念存在着明确的差异，[①] 对此下面仅举一例进行分析。

> 秦国南向的扩张，是其统一大计的重要步骤。秦国宣称：“得蜀则得楚，楚亡则天下并矣。”庄蹻的征伐目标是威胁秦国新近征服的四川地区，以遏制秦国对楚地的侵略。就是在这样的情境下，云南被带进多国相争的局势之中。虽然楚国的目标最终没有达成，云南的地理重要性却在中国首次一统为帝国时而得以彰显。云南以及即将出现的中华帝国，两者关系为云南参与中

① 简言之，“王朝”囊括的是“天下”，“中国”只是“王朝”的一部分，虽然是最为核心的部分。

国历史一事建立了某种模式，即当云南出现在中国历史舞台上时，多数状况乃是中国正在面对外部或者内部的某些危机。（111）

这段论述虽然可以被认为是对“史实”的描述，但按照现存史料，先秦和秦汉时期的“中国”在地理范围上通常指的是“诸夏”（即中原），[①]且很可能那个时候“中国”并未作为一个“国”出现，更不用说“帝国”了，因此“中国首次一统为帝国时而得以彰显。云南以及即将出现的中华帝国”，显然是研究者用现代概念对当时历史的描述。不仅如此，“两者关系为云南参与中国历史一事建立了某种模式，即当云南出现在中国历史舞台上时，多数状况乃是中国正在面对外部或者内部的某些危机”中的“中国”使用的也不是时人的概念。因此这段文字并不是“顺时而观”的描述，而是典型的“后见之明”。当然，这一论述本身并无绝对的对错可言，但放置在全书的背景下，则有可能会让读者误认为这一描述也是时人的认知，由此影响了读者对历史的理解。

更为重要的是，虽然“中国”是《流动的疆域》一书中最为重要的核心概念之一，且王朝时期“中国”的地理范围对于全书的论述是至关重要的，但令人惊讶的是该书通篇都没对此从时人的视角进行讨论，以至于通读全书都难以明确在书中各部分所使用的“中国”到底指的是什么。不过，正如上面的引文所展示的，《流动的疆域》一书所使用的“中国”概念很可能是杨斌以现代中国为基础建立的，由此也使得全书本质上是用今人的概念来对其论述的主题和对象进行理解，这也使得该书的叙述不可避免地带有强烈的“后见之明”的色彩。

虽然不是此节分析的主题，但由于涉及《流动的疆域》的主旨，因此在这里需要强调，正是由于该书对于这一重要问题的论述没有“顺时而观”，因此也就为其一些基本性的结论带来了问题。如《流动的疆域》提出“反倒是被中国人视为蛮夷的蒙古人，最终将云南纳入中国本部，并且开启了在经济上、文化上、族群上融合云南的过程”（109），但问题是其所论述的“中国”到底是什么。“中国本部”一词的出现，显然表达着现代人的认知，毕竟这一词汇没有出现在王朝时期。不仅如此，我们可以举出“云南”被纳入“中国”更早的文献。如《史记·天官书》载：“太史公曰：……三代，绍而明之，内冠带，外夷狄，分中国为十有二州，仰则观象于天，俯则法类于地。”[②]《史记·孟子列传》载：“以为儒者所谓中国者，于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一分耳。中国名曰赤县神州。赤县神州内自有九州，禹之序九州是也，不得为州数。”[③]由此在汉代，“中国”就被与囊括了“云南”的“九州”[④]等同起来。当然，此处并不想深入讨论王朝时期“中国”一词的概念，而是想指出，由于《流动的疆域》并未能从时人的角度“顺时而观”地看待“中国”一词，因而其在研究中，使用的大都是对这一概念的自己的认识，由此也就对相关问题的论述带来了诸多问题，如此处引用的这段文字中“反倒是被中国人视为蛮夷的蒙古人，最终将云南纳入中国本部”虽然不能被认为是绝对错误的，但却是可以被质疑的；“并且开启了在经济上、文化上、族群上融合云南的过程”这样的论述也是如此，毕竟“开启”一词属于我们现代人对历史进程的“定性”，但熟悉云南历史的人都应当知道，在此之前的史料中就已经出现了可以被解释为“融合”的情况。

---

① 王尔敏：《中国名称溯源及其近代诠释》，《中国近代思想史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 年，第 371 页。

② 《史记》卷 27《天官书》，中华书局，1963 年，第 1342 页。

③ 《史记》卷 74《孟子列传》，第 2344 页。

④ 虽然在先秦和秦汉的文献中对于“九州”有着多种记载，但其中最具影响的是《禹贡》“九州”，汉武帝设州基本是以其为基础的（邹逸麟：《中国历史地理概论》，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 年，第 174 页）。《禹贡》记载“华阳黑水惟梁州”，虽然对于“华阳”和“黑水”的具体所指学界存在争议，但基本都认为今天的云南，或者至少云南的大部分包括在“梁州”的范围内。

还有在书中各处使用的“边疆”一词，如“而云南从秦汉以来，多数时间皆在中央王朝管辖之外，直到宋末元初之际忽必烈征服大理王国之后，反而失去自主而成为中华帝国的边疆，并被现代中国视作族群多样性之统一的象征”（6），“汉室一面采取与匈奴‘和亲’之政策，一面认可赵陀为‘南越王’，同时维持越南北方及南方边疆的和平”（112），且不说无论其对“越南北方”“云南”“南越”与“王朝”之间关系的认知，还是论述中使用的“中央王朝”“中华帝国”这些概念的“现代性”，仅就“边疆”一词而言，其在王朝时期极少被使用，且王朝时期的“边疆”也与今天作为“民族国家”之下的“边疆”在含义上存在着差异。当然还有该书书名中的“疆域”一词，王朝时期虽然有着这一词汇，但其含义与今天的是否存在差异，这同样是一个非常严肃的值得讨论的学术问题，但全书对此同样缺乏讨论，更不用说是“顺时而观”的讨论了。

由于对书中所使用的各种核心概念缺乏从历史情境的讨论，因此虽然《流动的疆域》希望“顺时而观”，但实际上讲述的是一个现代人所理解的历史进程及其影响因素，且在书中似乎也看不到杨斌试图或努力从时人[①]的角度来理解历史。不仅概念方面如此，从整部著作的论述方式来看，《流动的边疆》都远远没有达成其所设定的这一看待历史的视角。

“顺时而观”和“后见之明”都有其价值，但如果读者认为杨斌的叙述是“顺时而观”的话，就会认为其所论述的是时人的所思所想，贴近“史实”，由此也就带来了误导，影响了读者对历史的认知和判断。如果杨斌意识到他自己的研究视角同样是“后见之明”的话，那么同样应当意识到他的研究与“中国中心论”都属于“后见之明”，两者都属于同一层次的历史解释，是两种可以并存的历史解释，因此作为研究者，对于“中国中心论”虽然可以批评，但不能否定。

当然，未能像其宣称的那样做到“顺势而观”，而属于典型的“后见之明”，这并不是该书最为核心的问题，该书最大的问题在于其论述逻辑以及运用史料的方法并不能证明其结论。

二

如前所述，《流动的疆域》实际上预设了一个前提：在云南的形成中存在三个并列的角色，即“中国、国际以及地方”，虽然其强调的“地方”在他的论述中由于种种原因消失了，但其将所选择的主题放置在“中国”和“国际”两个角色之下讨论本身也是一种极大的突破。虽然这一思路非常出色，但如果通篇考虑该书的论述方式的话，就会发现杨斌实际上并没有做到这一点，反而让我们疑虑其是否为了突出上述立意，通过各种方式有意对“史实”以及史料从其论述的需要加以选择、处理和论述，由此也就降低了其论述的说服力。下文按照该书的章节顺序对此进行分析。

首先，《流动的疆域》使用大量篇幅强调了云南在全球贸易中的位置，或者至少在一个广大区域贸易中的位置，以及云南与中国之外的很多区域存在各方面的联系，即：“本章论述这条路线一方面对于塑造所讨论区域的巨大影响，另一方面也与其他两条丝路结合，三条丝路相辅相成，构成了一个系统性的贸易网络。某种程度上，本章在试图揭示云南与邻近地区人群的诸多联系以及云南在世界历史中的重要性之际，也为我们对于东西交通的理解增加了新的维度。”（53）从其他学者的评价来看，这一历史解释有一定合理性。不过问题在于，虽然云南与“中国”以及“中国”之外各个地区存在广泛的经济联系，甚至存在经济之外的文化等众多方面的

① “时人”，包括国际、中国和地方，且这里的“人”指的也不是具体的人，可以广义地认为是当时的历史背景。

联系，但由此并不能对“云南必然被纳入中国”这一命题给出否定和肯定的回答，因为一方面无法真正对经济、文化之间联系的强度进行量化，由此也无法进行比较，另一方面经济、文化等联系的强度与“被纳入”之间似乎也并不存在必然的联系。

杨斌显然也意识到了这点，由此在结论中提出：“本章描述了云南如何靠着整合西南丝路而成为跨区域贸易的核心。西南丝路引起许多关于云南的有趣问题：为什么缅甸、越南、泰国都维持了其独立地位，而云南却不能呢？为什么云南作为一种异己的非中国文化，会成为中国的一部分呢？这个转变是在何等场景下发生的呢？”“由于云南与东南亚、西藏、中国等地有密切的关系，因此，单方面的中国式解释——无论此等解释是在批判中华帝国主义或颂扬中国文化之精深——都无法解释中国如何成功统合云南。”（94）

如何讨论这一问题呢？杨斌给出的方式就是：“云南与诸多文化的诸多联系表明，唯有采取全球视野，方能解释中国统合云南的成功；然而，目前为止这一过程依然还只是在国族的历史范畴中探讨。透过想像而建立起来的国家或区域的边界，某种程度反而阻碍了这个世界——也包括云南这样的边疆地区——原本全面的、深刻的、生动的景象”。（94）这点本身也是一种非常合理的切入点，但现在的问题是，他是否在论述中做到了这点？

此后第三章的标题是“征服云南：一个跨区域的分析”，熟悉云南历史，或者读过一些叙述详细的中国通史的学者对这章中的描述应该非常熟悉，其讲述的几乎都是传统“中国中心主义”下的那些“史实”，在其中几乎看不到创新性的“国际”“全球”“跨区域”的视角。唯一对这方面较多的论述只是出现在“重新解读中古时代的南诏”一节中，在其中杨斌提出：“关于这三个王朝任一者的研究，都应该放在它们的国际／全球背景脉络中。再者，若我们将南诏、吐蕃、唐代中国、其余中亚政权、甚至是阿拉伯与印度的国家，通通视为同一个世界，那么，或可开辟新的面向，因为这些政权的军事、政治、商业及文化交流互动，远比大多数人所想像得深切。”（128）虽然这一论述非常有价值，但这一节仅仅 1 页多一点，实在看不出太多“国际”视野下的具体论述。即使是所谓的“跨区域”，在熟悉中国史的学者来看，似乎也没有什么新奇之处，毕竟谈论“云南”历史的时候，不可能不涉及其他区域，这在以往众多的相关研究中都能看到，由此，其结论中提到的“全球性的力量促进了中国对云南的军事征服”让人有些摸不着头脑，毕竟其所涉及的“全球性的力量”与我们通常的理解以及对他论述的预期（至少应当包括东南亚地区）存在太大的差距。

杨斌是如何达成其所强调的“全球”“国际”“跨区域”的视野呢？典型的处理方式以下面几段具有代表性：

> 很显然，若不是吐蕃帝国兴起并威胁唐代中国的西北至西南边疆，唐朝不会花费大量心力强化自身在西南的权威并削弱当地的自治性。与汉代情况相似，中亚地区的权力竞争决定了唐代中国的西南边疆政策。两个时代的唯一差别在于，此时云南的南诏政权在国际政治中扮演非常积极威武的角色。（118）
>
> 检视两方史料后，我们会不禁好奇，南诏为什么一会儿与唐代中国结盟、一会儿又与吐蕃结盟，或者同时与双方联盟。笔者试图吸收吐蕃与唐王朝双方的观点，剔除它们的民族主义偏见，建构一个以南诏为基础的解读。进行深入解读与比较之后，一个活力四射、深思熟虑的南诏呼之欲出。它熟练地利用邻国与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以追求自身的根本利益。（119）
>
> 因此，宋代的国际政策乃是封闭西南边疆、孤立大理，将主要心力放在北方边疆。毕竟，北宋的政治、经济中心是在黄河流域。（130）

即使不考虑这些段落中使用的词汇“吐蕃帝国”以及“唐代中国”的具体所指及其“现代性”等问题，熟悉中国史的学者也会意识到，如果去掉这些段落中的“国际”一词的话，那么上述

论述基本就成为了我们所熟悉的那些传统“中国中心主义”的历史叙述，由此可以认为这一章中对“国际”和“跨区域”的论述似乎只是通过措词来达成的，而没有对视角和描述的方式进行根本性改变。

不仅如此，《流动的疆域》在第三章以及全书中大量使用“征服”一词，以及使用类似于“古代中国的一些学者批评宋室之战略错误，清代学者倪蜕就指出，宋朝面对大理国时不应该采取孤立主义政策”（135）等非常现代性的表述来制造一种“国际”和“跨区域”。当然，虽然从历史研究而言，这样的措词本身没有问题，但问题在于“国际”和“跨区域”或者“全球史”的论述视角等并不能只是通过使用措词和现代的表述方式来达成，而应是基于这些视角对历史及其进程进行重新描述。

虽然《流动的疆域》在第二章中展示了云南与周边众多地区存在经济上的往来，但在第三章中，我们似乎又看不到这种联系。对此，虽然杨斌在序言中对此进行了提及和反思：“再如，本书第二章强调云南跨地区的贸易与文化联系，但在后来的章节几乎不置一词，似乎元、明、清时期这样的跨界交流不存在了，这固然是由于议题选择之无奈与无力，也当然是笔者认识之局限，否则行文亦可略加叙述。此乃另一大失误。总体而言，一方面是在许多细节上过于依赖中文文献，另一方面是本人失察，使得对中国中心论的反思和破解仍有许多未尽之努力。”（21）但这一问题对于该书的主旨和立意是至关重要的，因为由此作者实际上并未真正展现该书书名中的“全球视野”。这点并不能用缺少史料这样的方式来推脱，特别是一部力求创新的严肃的史学著作；且这样的问题不仅存在于第三章中，而且存在于整部著作中。如果以这样的方式可以达成“国际”和“跨区域”或者“全球史”的话，那么以往传统的绝大部分“中国通史”也就很容易改写为“全球史”视野下的历史了。

除没有达成“国际”和“跨区域”的视角之外，在第三章中，杨斌似乎没有对当时“中国”如何看待“云南”这一问题进行严肃的讨论，也即没有达成“中国”的视角。如：“大理与宋代中国的关系被人为抑制，不如南诏时代那般复杂。宋朝的节制可能是来自历史教训与实际考量，南诏作为麻烦制造者的印象还鲜明地存在中国人的心中；实际上，宋代统治者们也衡量过对云南动武的风险与回报。宋将王全斌在平定四川之后请求进攻云南，但开国君主赵匡胤却下令他停止，说：‘德化所及，蛮夷自服，何在用兵。’关于赵匡胤之决定，有一浪漫传奇故事重复出现在中国的历史记载中：赵匡胤拿了把玉斧在帝国地图上沿着大渡河画下边界，说‘此外非吾有也’。宋挥玉斧象征着宋朝绝对无意将云南纳入版图之中。”（129）可以明确地说，在宋人看来，“中国”与“宋朝”并不是一个概念，这段论述及其引用的史料只能说明宋朝不接受南诏的臣属，但并不能证明宋人对“南诏”与“中国”之间关系的看法。当然，这里并不是认为杨斌的观点有问题，而是指出其对所得出的结论实际上没有从当时“中国”的视角进行讨论，而是从今人的角度进行认知，即认为宋朝是帝国且等于中国，由此其不将南诏纳入版图，也就表达了宋人不认为应将南诏纳入中国。

“军事征服之后，中华帝国所要做的就是要统合这块土地及其人民，使得云南真正成为中国的一部分。以下章节会详述中国制度如何与土著政权发生摩擦、冲突，以及中国制度最后如何扎根于云南，由此塑造出一个‘中国的云南’。”（138）虽然这是第三章的结论中的论述，但简明扼要地表达了第四章“‘因俗而治’：土司制度的兴衰”所要讨论的内容。熟悉中国史的学者同样会对第四章论述的内容并不陌生，基本都是传统“中国中心主义”下经常撰写的那些内容。那么《流动的疆域》是如何达成其论述的目的的呢？这点实际上只要读一下第四章的导论即可明了：

自元代（一二七九年至一三六八年）以来，历代王朝政府迁徙了上百万汉人至云南，转化了当地社会的人口结构。中央行政管辖、移民、赋税、教育、经济与宗教的基础建设将中国的风俗制度引入云南，造成该地区的“华化”。与此同时，云南当地族群对于汉人移民也有诸多影响，造成了移民的“土著化”。“华化”与“土著化”是云南历史进程的一体两面；透过这种交互作用的进程，得以调和出一个中间地带。

本章将会检视中国历代王朝实施于云南、重组地方权力结构的行政体系。为求掌控所谓的“西南夷”，中国政府借用、创造、调适、发展了一种特别的行政机制，那便是“土司制度”。土司被授予帝国的官阶、头衔、职位，各自统治他们的土地与人民。只要没有大型叛乱发生，帝国政府鲜少干涉土司内部事务。一言以蔽之，“因俗而治”是中国西南边疆政策的指导原则。

中华帝国与土司之间的权力关系是动态变化的，因而中间地带经常摇摆不定。一旦帝国政府力量充足，便企图将边疆转化为另一个中国社会。在此进程中，土司或被打垮、或受到压制，当地族群则成为少数族群、当地文化沦为边缘文化。经过数百年的努力，中央政府任命的流官制度最终代替了土司制度。在长达五百年的进程中，土司体系的建立、制度化，以及其最终的改革——“改土归流”，高度反映着中华帝国“教化”边疆与族群的自觉、决心与力量。（146）

从表面上看来，这段论述似乎符合“史实”，但如果分析其论述视角的话，就会发现实际上并非如此。因为通读这段就会发现，无论其所举的例子还是措词，都会让读者认为云南是“被”纳入“中国”的，是“被动的过程”，这显然走到了与其所批评的传统的“中国中心主义”相对的另一个极端。虽然正如杨斌自己所论述的，现存的汉文史料是“中国中心”的，但一个群体对于外来文化的态度肯定不是铁板一块，因此他这样的论述显然是基于其目的通过有意识地选择和解释材料而对历史的构建。实际上该书的序言中对现存汉文史料的评判已经体现出他为了达成其论述目的而持有的“刻意”的态度：“比如，中文文献经常提到边疆的土著、社会和政权如何仰慕中国文化，如何要求内附中华帝国，如何折腰于帝国的恩遇等等，这些不过是中国文化至上的世界观、制度（如朝贡制度）和政策的具体体现，不过是中国单方面的叙事，不能信以为真全盘接受。在‘艳羡’、‘仰慕’和‘自愿归附’的背后，往往是大兵压境，或者是其周围以及内部自身各种权力斗争的推动。在这些带有深刻文化和价值观印记的语言背后，读者们需要体察和同情边疆族群、社会与政权自身的活力和灵动。他们或不得已而为之，或因自身利益主动迎合，但是不表示他们内心真正认同中国文化、世界观和价值观。”（13）虽然确实有可能是“他们或不得已而为之，或因自身利益主动迎合”，但为什么不可能有部分人确实是“内心真正认同中国文化、世界观和价值观”呢？[①] 而“在‘艳羡’、‘仰慕’和‘自愿归附’的背后，往往是大兵压境，或者是其周围以及内部自身各种权力斗争的推动”这样的论述同样也是一种“片面”的强调，尤其是“往往”一词的使用。

总体而言，杨斌通过这样的“刻意”表达来强调“云南”与“中国”的对立，那么其为什么要强调这种“对立”呢？主要可能是希望符合该书论著的主旨，即云南是“被”纳入中国，且在此过程中，“云南”缺乏其主动性。

关于第五章的问题将放到下一节讨论，总体而言，这一章也缺乏说服力，且至少可以认为

① 这方面的史料实际上众多，如南诏太和城遗址中的《南诏德化碑》，其中载：“王姓蒙，字阁罗凤，大唐特进云南王越国公开府仪同三司之长子也。应灵杰秀，含章挺生，日角标奇，龙文表贵。始王之在储府，道隆三善，位即重离。不读非圣之书，尝学字人之术。抚军屡闻成绩，监国每著家声。唐朝授右领军卫大将军兼阳瓜州刺史。”（《南诏德化碑》，大理市文物保护管理所，1988 年，第 4 页）这段来自南诏的文字，不仅记载了阁罗凤所任唐朝的官职，而且“不读非圣之书”一句也展现出儒家文化的影响。对于“他们或不得已而为之，或因自身利益主动迎合”，杨斌似乎也没有提出太多的史料证据。

作者可能不太清楚王朝时期“中国”的概念及其历史。

第六章“白银、贝币与铜政：云南的经济转型”，可以看成接续第四章，从经济层面讨论了云南被纳入中国的过程：“本章将考察明清之际铜钱取代贝币。云南的贝币体制，不但证明了全球及区域的贸易力量如何合力塑造地方发展；贝币体制的最终崩溃，也象征着云南经济转向中国的发展——因为中国货币体制压倒印度洋以贝币为基础的贸易习俗。明代的云南人口已有三分之一为汉人，随着清代移民涌入西南地区，到了公元一八五〇年时，汉人已占云南人口的百分之六十。这在云南史上是汉人人数首度超过非汉人人口，使得非汉人居民在整体上已经变成少数。这一人口方面突破性的格局，一直延续至今。”（249）这一章的目的在该章结论中表达非常清楚：“因此可以说，国际性因素有助于云南经济轨道的转变，并由此导向中国。欧洲世界体系之扩张以及日本一七一五年关于洋铜出口之规定，这两者都促进了中国对云南的经济整合。”（293）即希望在“全球”“区域”等视野下从经济角度讨论云南被纳入中国的过程和原因。由于笔者并不熟悉经济史的研究，因此对于本章的具体观点无法做出恰当的评价。不过，本章有着很多在第四章中存在的问题，此处只举出两个例子予以说明。

如关于云南贝币在17世纪中叶崩溃的原因，杨斌基于以往的研究归纳出两点，即“看起来，内部变化与全球变化两者皆是促成十七世纪中期云南贝币崩溃的原因”（263），但其在没有否定“内部变化”的原因的情况下，在这一段的结论中则提出“总的说来，贝币在云南长时间的存在，是西南丝路将云南及印度洋贸易结构密切连结的结果；而贝币急速从云南消失，很大程度上是欧洲现代世界体系扩张进入印度洋的结果”（264）。那么他为什么会对两点“原因”进行如此的主观取舍呢？显然因为“全球变化”更符合其论述的主旨，但如此处理，显然是不严谨的。需要强调的是，这并不是对其结论的评判，而是对其论述方式的质疑。

再如，杨斌提出“地方资源被用来服务国家利益，云南便是最好的例子。因此，中国历史上的繁荣至少有部分是靠耗尽边疆与边缘区域的当地资源来达成，这个说法，可谓公允”（254）。在这段论述中，杨斌通过使用“繁荣”和“耗尽”这样的词汇，将作为边疆或者边缘地区的“云南”与“中国”对立起来，但既然作为“中国”一部分，那么“边疆”还是“边缘区域”都必然要为“国家”整体的“繁荣”做出贡献，因为两者虽然存在一定的对立，但同样也存在“荣衰与共”的关系，显然杨斌只强调了其中一面。此外，他的论述还忽视了王朝调用内地资源对边疆的支持和帮助，如“协济”。由此他的论述真的像他所说的那样“公允”吗？这样“不公允”的表达显然是为其全书的论述目而服务的。

总体而言，就该书的主体部分而言，杨斌虽然希望从“国际”“全球”“区域”的视野，以“国际”和“中国”为角色，来讨论云南被纳入中国的过程，但实际上这些目的都没有真正达成。除了关于经济的两章之外，也基本看不到真正意义上的“国际”“全球”的视野，虽然其确实涉及到了“跨区域”，但仅仅是在传统的历史叙述上用措词等方式进行了包装而已，缺乏看待和描述历史时视角上的真正改变。且为了达成这些目的，杨斌通过对史料的片面和刻意强调，采用遣词造句的方式以及有意无意地使用一些现代概念且同时忽视了各种概念在王朝时期的含义，来达成其将“云南”与“中国”“对立”起来的目的，因此就该书而言，实际上是杨斌基于其目的“制造”的一个云南“被”纳入中国的历史。

虽然从某种意义上，所有历史叙述都是在制造历史，但关键在于，由于其没有从本质上改变论述方式和视角，而只是通过对史料和“史实”基于其目的进行有意地选择和解释，以及使用了大量可以达成其目的的具有“导向性”的措词等等方式来达成其论述的目的，有着有意“制造”的痕迹，由此也就使其论述失去了说服力。

三

第五章，即“华化与本土化：云南人的形成”是《流动的疆域》一书比较重要的一章，这点阅读杨斌所作的序言即可明了，确实在其中他也提出了一些不同于以往的观点：

> 最初，“云南”这个词本是西汉王朝的想象之地，后来逐渐被作为行政单位，指代一个县、大理国、以及中华帝国的一个省；也就是说，所谓的“云南人”原本是不存在的。随着云南成为帝国的一个行政管辖单位后，中国人（汉人为主）、中华文化（儒家文化为主）和经济、社会生活方式逐渐在云南落地发展，“华化”逐渐取代了“土著化”。云南的各个土著群体以白人以及其菁英阶层的“华化”最早最深，而云南的汉人移民最热衷于参加帝国的教育与科举。早在明初的永乐年间，永乐皇帝就钦点了以“云南人”为自我身分认同的儒生。虽然笔者认为“云南人”这个身分在云南当地被广泛接受还需要经历数百年的历史进程；但“云南人”这个新的省级身分在明代中后期的出现，不仅象征了中华帝国融合云南之成功（换言之，云南真正成为中国的一个组成部分），也丰富了作为身分认同的“中国人”这一概念。（8）
>
> “中国人”作为自觉之概念，当然是在鸦片战争后的中外冲突过程中逐渐成形。不过，中国人作为自然形成的一种“政治、文化和族群主体”，应该可以追溯到早期的帝国时代。那么，这个“主体”究竟如何形成？其形成的机制又是什么？在中国这个历史舞台上又是如何“自我表述”以及“自我呈现”呢？
>
> 笔者在此大胆地提出：省级的身分认同，既是中华帝国时期中国人的基本组成单位，也是中国人在中国境内的自我体现，这在明清时期尤其如此，并为现代中国的认同奠定了基础。从明代的十三省到清代的十八省以及东北，基本上形成了以省级行政单位为认同的地方身分，各地的帝国臣民以此在帝国官方和民间的各方面的空间（如科举、赋税、会馆等）游弋交流。而云南人便是这种省级认同中的后来者。因此可以说，云南人的前提便是中国人，不言而喻的含义便是中国的云南人。这是笔者研究云南的终极目标。（9）

对于第一段中的论述，本文基本赞同，从“顺时而观”的角度，“云南人”作为以“省份”为单位的有着自我认同的“人群”确实无法在云南成为“省”之前就存在，当然这是一个太过于显而易见的“史实”。[①] 本文不赞同的是“‘云南’这个词本是西汉王朝的想象之地”的说法，因为从“后见之明”的角度，我们可以认为汉朝士大夫以及民众对于遥远的云南可能存在诸多想象，但从“顺时而观”的角度来看，则不能不承认的就是，这种“想象”对于汉朝的士大夫以及民众而言，有可能就是“事实”。这点类似于《禹贡》中记载的类似于“黑水”等的遥远河流，虽然今人可以认为这些河流即使存在一些事实基础，但很可能是当时人的想象，不过对于王朝时期的人而言，他们显然认为这些河流是真实存在的，否则历代学者就不会费尽心力去考证它们的所在以及对应于哪条河流了。虽然杨斌这样的认知又是一种典型的“后见之明”，但对于《流动的疆域》的本章而言，这并不是一个太重要的问题。

就篇幅而言，第五章花费大量笔墨讨论了明清时期“云南人”的形成过程。杨斌在这一章中主要讨论的实际上是前面引用的第二、三段文字所表述的内容，但这也是本章问题最大的部分。

首先，“中国”一词在王朝时期的含义非常丰富和复杂，也存在诸多演变，且涉及的地理空间也存在变化，由此对应的“中国人”一词的含义也是如此。对于有着如此丰富和复杂含义的

① 虽然从“顺时而观”的角度来说，由于云南作为县出现得很早，因此也许“云南人”早就存在，但显然这一词汇含义并不是我们通常所使用的含义。

“中国”和“中国人”，杨斌在本章中没有进行任何讨论，且其论述也颇为模糊，如从“不过，中国人作为自然形成的一种‘政治、文化和族群主体’”来看，杨斌应该也认识到了“中国人”一词应当有着多种层面的含义，但是在这前一句中他又写到“‘中国人’作为自觉之概念，当然是在鸦片战争后的中外冲突过程中逐渐成形”，此处的“中国人”似乎指的又是作为现代民族国家的“中国人”，由此两句之间的“中国人”明显是不对等。当然也有可能杨斌认为鸦片战争时期的中国人是从之前时代演化而来的，不过他并没有明确说明这点，且在整章中似乎也没有对这种演化过程进行过论述，而只能让读者自行推测。

最大的问题在于其所“大胆地提出”的“省级的身分认同，既是中华帝国时期中国人的基本组成单位，也是中国人在中国境内的自我体现，这在明清时期尤其如此，并为现代中国的认同奠定了基础”。看到这一句话的时候，很多熟悉中国史的人对此都会非常惊讶，因为在史料中，“中国人”一词早就已经出现，如《史记》卷一百十三：“南越王，尉佗者，真定人也，姓赵氏……至二世时，南海尉任嚣病且死，召龙川令赵佗语曰：‘闻陈胜等作乱，秦为无道，天下苦之，项羽、刘季、陈胜、吴广等州郡各共兴军聚众，虎争天下，中国扰乱，未知所安，豪杰畔秦相立。南海僻远，吾恐盗兵侵地至此，吾欲兴兵绝新道，自备，待诸侯变，会病甚。且番禺负山险，阻南海，东西数千里，颇有中国人相辅，此亦一州之主也，可以立国。郡中长吏无足与言者，故召公告之’。”[①]《南齐书·魏虏列传》载：“伪征北将军恒州刺史巨鹿公伏鹿孤贺鹿浑守桑乾，宏从叔平阳王安寿戍怀栅，在桑乾西北。浑非宏任用中国人，与伪定州刺史冯翊公目邻、安乐公托跋阿幹儿谋立安寿，分据河北。”[②]《新唐书·高丽列传》载：“武德初，再遣使入朝。高祖下书修好，约高丽人在中国者护送，中国人在高丽者敕遣还。”[③]《隋书·齐王暕列传》载：“有遗腹子政道，与萧后同入突厥，处罗可汗号为隋王，中国人没入北蕃者，悉配之以为部落，以定襄城处之。”[④]《辽史·地理志》载：“周广顺中，胡峤《记》曰：上京西楼，有邑屋市肆，交易无钱而用布。有绫锦诸工作、宦者、翰林、伎术、教坊、角抵、儒、僧尼、道士。中国人并、汾、幽、蓟为多。”[⑤]

显然在“省”出现之前，“中国人”一词就已经被使用，且仅从上面的引文来看，都有着明确的指代，因此杨斌提出的“省级的身分认同，既是中华帝国时期中国人的基本组成单位，也是中国人在中国境内的自我体现，这在明清时期尤其如此”显然存在问题。但也许杨斌此处的“中国人”有着其他所指，或者至少不同于前文所引用史料中那些“中国人”，但正如前文所述，其在书中对此基本没有进行论述；或者杨斌所述的“中华帝国时期中国人的基本组成单位”缺少了一个时间限定，而这些同样需要读者去猜测。

即使将杨斌的叙述归结于缺少时间限定，从而部分成立的话，这一论述最根本的问题在于其论断的基础，即“地方认同”（具体就是“云南认同”）与“中国认同”之间的关系，对此他论述的颇不清晰。从“因此可以说，云南人的前提便是中国人，不言而喻的含义便是中国的云南人”（9）以及“因此造就了并行不悖的双重认同：首先是中国性，其次是地方身分。在此意义下，‘云南人’的出现对于中国性颇为关键，因为这种地方认同的前提是中国身分认同”（233）来看，似乎杨斌认为首先要有着“中国身分”，才能有“这种地方认同”。

但杨斌在后文引用了魏源的认知，“魏源将俄罗斯（这很明显）、朝鲜、蒙古、维吾尔地区（‘回部’）、西藏（‘卫藏’）排除在中国之外，即便清帝国对于西藏有所控制，对蒙古地区有更

① 《史记》卷 113《南越列传》，第 2967 页。

② 《南齐书》卷 57《魏虏列传》，中华书局，1972 年，第 996 页。

③ 《新唐书》220《高丽列传》，中华书局，1975 年，第 6187 页。

④ 《隋书》59《齐王暕列传》，中华书局，1973 年，第 1444 页。

⑤ 《辽史》卷 37《地理志一》，中华书局，1974 年，第 441 页。

大的控制”，然后提出：“对比之下，在魏源的‘中国’里头，云南是其中一省，毫无疑问是中国的一部分”（235），这一论述的基础就是“逻辑上说，省级认同在帝国内部的场景中，就是用来表达‘中国性’。多数中国人因此根据省级标签自我分类以及被归类”，因此蒙古、西藏没有建省，也就没有省级认同，所以无法表达“中国性”，由此在他来看，“省级认同”（即一种“地方认同”）似乎又是“中国认同”的基础，这似乎与之前的论述存在根本性的矛盾。

最为核心的问题在于杨斌论述的核心要旨是将省级的“地方认同”与“中国认同”建立了直接和必然的联系！但问题在于，虽然“中国”与“地方”必然存在各种各样或明或暗的联系，但在“认同”方面，“中国认同”和“地方认同”之间存在必然的联系吗？对于这一至关重要的论述前提，杨斌根本没有进行论证，只是简单地提到“长久以来，中国菁英是以其家族或宗族起源地来认同自我，有许多家族姓氏可以追溯到中古早期的‘郡望’”（234），这显然根本谈不上是一种论证。

即使是其所论述的明清时期，也可以指出众多反证，如图里琛在《异域录》中记载：“我等答曰：途中一切供应，并无缺乏，亦不甚劳苦。去岁，我等自厄尔口地方起程，来时沿途虽皆有山峦林薮，我等俱舟行不觉。自雅板沁地方，陆行沿途皆林薮，道路狭隘，泥泞处甚多。我中国并无此等地方，亦不曾见。我中国地方，南至南海，东之东海，西与西藏之西沙章汗接壤，此等地方我国之人皆曾到过。惟沙章汗地方未到。在北则有尔国地方，我等初次到此。我中国并无似尔国地方者。”[①] 其中西藏已被认为是“中国”的一部分，由此“西藏人”显然在这一层面上也就是“中国人”了，而西藏没有建省，由此“中国认同”与省级“地方认同”之间也就没有了直接联系。当然，本文并不是否定“地方认同”与“中国认同”之间的联系，只是强调杨斌并没有对这一作为其论证最为基础的核心问题进行讨论。最后实际上只要回归到简单的“史实”就会发现杨斌的这一论证存在的根本性问题，即“中国”并不是自古以来就有的，那么按照杨斌的逻辑，难道在此之前就不存在“地方认同”？

我们不能忽视文献中的自先秦以来对何为“中国”的一些讨论，如《战国策》卷十九所载：“公子成再拜曰：‘臣固闻王之胡服也！不佞寝疾，不能趋走，是以不先进。王今命之，臣固敢竭其愚忠。臣闻之：‘中国者，聪明睿知之所居也，万物财用之所聚也，贤圣之所教也，仁义之所施也，诗书礼乐之所用也，异敏技艺之所试也，远方之所观赴也，蛮夷之所义行也。’今王释此而袭远方之服，变古之教，易古之道，逆人之心，畔学者，离中国，臣愿大王图之！”[②] 还有《礼记·王制》载：“中国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东方曰夷，被发文身，有不火食者矣。南方曰蛮，雕题交趾，有不火食者矣。西方曰戎，被发衣皮，有不粒食者矣。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中国、夷、蛮、戎、狄，皆有安居、和味、宜服、利用、备器。五方之民，言语不通，嗜欲不同。”[③] 因此，在某种层面上，王朝时期的“中国”认同的一个重要基础就是“文化”，当然还存在“地理”层面的影响，比如儒家经典《禹贡》“九州”对“中国”地理范围的影响等等。

总体而言，首先，第五章中杨斌的论述逻辑上不清晰，至少并不容易理解；其次，没有对核心概念“中国”和“中国人”进行讨论；再次，没有对作为其论证基础的“中国认同”与“地方认同”之间的联系进行论证；最后，忽视了王朝时期影响“中国认同”诸多因素。“中国认同”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杨斌在论证时不仅进行了极大简化，而且几乎忽视了之前的以及同时代的所有其他与此有关的史料，似乎颇为不当，可以推测其为了强调“云南”与“中国”之间的关系，而对历史按照其需要进行了叙述。由此可以看到，在进行这一研究时，杨斌带入

---

① 图里琛：《异域录》卷下，《文渊阁四库全书》电子版。

② 诸祖耿编撰：《战国策集注汇考（增补本）》卷 19《赵二·武灵王平昼闲居》，凤凰出版社，2008 年，第 966–967 页。

③ 朱彬撰，饶钦农点校：《礼记训纂》卷 5《王制》，中华书局，1996 年，第 191–192 页。

了众多的“后见之明”，没有试图去理解时人对此的认知；且即使是“后见之明”的论述，在论证方面也存在众多问题，不具有说服力。由此，这一其“研究云南的终极目标”并没有达成。

四

虽然《流动的疆域》无论是研究方法、研究的切入点，还是某些结论，以及学术指向都非常具有价值，甚至在今天依然如此，但就其论述而言，无法看出其论证中有着真正的“跨疆界”或“全球史”视野，似乎也难以认为其确实将“中国边疆史、地方史作为世界史来研究”，更不用说“在方法论上主张将中国置于世界之中，而不是世界之外”了。虽然其批评了北方中心论、中国中心论和族群上的汉人中心论，但其实际上又通过遣词造句等方式基于以往北方中心论、中国中心论和族群上的汉人中心论的论述“制造”了另一种相对的历史。虽然所有历史叙述都是在制造历史，但由于该书缺乏研究视角上以及历史叙述上的根本性转变，而只是对以往研究按照其需求进行了包装，“制造”的痕迹过于明显，也就降低了其论述的说服力。且更为重要的是，这样的“制造”从根本上也就违背了杨斌自己的“顺流而下，而绝不能以今推古”“置于其原来的历史场景之中”的原则。最后，由于无论是在论述逻辑、概念，还是在“史实”方面都存在诸多根本问题，因此其所希望的从讨论“云南人”的身份（认同）入手来讨论“中国”“中国人”这一概念的形成以及认同的目的也根本未能达成。而且，在我们看来，在已经意识到以往“中国中心主义”存在的问题的情况下，还按照相同的研究思路（不是研究视角），基于目的对历史进行“刻意”的书写，在研究态度上也是需要被质疑的，因为至少以往“中国中心主义”的论述很多情况下是“非刻意的”。

评价一本著作要放在其形成背景下。《流动的疆域》作为 21 世纪初的博士学位论文，无论是立意还是选题都非常杰出；且该书希望论述的一些主题放在今天来看都是具有挑战性的研究，更不用说“中国”以及“中国人”这样在当前学界都具有挑战性的研究了；当然还要考虑到那个时代资料的限制。因此，虽然本文对该书提出诸多批评，甚至对整部著作持非常严厉的否定性评价，但依然认为该书在其形成的年代是有意义的。此外，这篇书评是站在今天学术角度进行的，距离这本著作的最初完成已经快 20 年了，所以本文的有些评价多少有些“不公平”。

最后，作为研究者，我们总是要在自我否定中前进。“一千个观众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本文对《流动的疆域》一书的理解可能并不准确和全面，因此上述评价很可能存在问题，敬请杨斌和读者原谅。